



有一种记忆叫“远方”

李俊玲

又见到老叔了，他额头的皱纹让我想到了旱季里的坡地，一层层皱着干涸，躯体明显比前几年佝偻了些，年已七旬的他看起来比父亲苍老了许多，病痛也开始纠缠这个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的老人。我从包里拿出刚在县城买来的风湿药膏和感冒常用药递给他，一边交代着用法和用量。老叔说：“你不用买这么多，我们现在离村卫生室只有几步路。”“刚才我还和你叔妈说你要回来，话音才落地，你就到家了”。路通了么，开车不到一个小时，你还想着像我们小时候那样啊，说回来一去得花半天的时间。”我提到了从前，老叔立马感叹起来：“你们小时候回来一趟也不容易呢，尤其是五荒六月下雨天，雨大路滑走不惯，回到家就像刚出田的泥鳅，让你阿奶看得心疼。”我下意识地看了看屋外平整的水泥路，老叔他们已搬迁到离老家3公里外的叫做“得埃乌”的新寨子，住进了人们说的城里人才有的白楼房，看着曲屏电视，用着全自动洗衣机。老叔说，这辈子能过上这样生活，和你叔妈可以安心闭眼走了。说的时候，语气里没有一丝哀伤，而我听着心里却泛起酸楚。

“得埃乌”是布朗语，意为“本人的山”，这个名字是老家所在的大中村支书李新兆起的，他在电话里和父亲说到新寨子的名字时，父亲连声称赞，说起太好了，话毕，眼睛竟湿润起来。我知道，对于父亲这一辈布朗人而言，山地代表着超出生命之外的意义。他们从小便是在祖先们的口耳相传中，得知脚下这片土地所历经的更迭与沧桑，布朗族是濮人的后裔，哀牢国这块红土地上最早的主人，原居于保山坝一带，世代过着朝起暮归的农耕生活。元明统治者武力征服云南后，官吏们对当地土著实行“雄刺渔猎”的压迫剥削，从此打破了布朗族的平静与恬然。在统治者残酷压榨下，为求一条生路，布朗族被迫迁移到勐底坝（今施甸坝）居住，然而这块土地依然不是他们的久留之所。当地土司在划属耕地时，落后的布朗人实行了祖先最原始的结草记事，将所划山地用草绳标记，他们认为这一根根草绳足以表示所属领地的范围，

却没想到一场大火之后领地却成了别人所有。草绳灰飞烟灭，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块强蛮的界碑，冰冷的文字与烧不毁的石头让布朗人带着伤痛和无奈又一次迁徙，来到了偏僻的深山老林。这里没有可取的财富，自然也就没有了阴暗的纷争。在野兽出没的深山里，先祖们凭仗无畏和顽强安家落户，代代繁衍生息。大山以厚实的胸膛接纳了这群颠沛流离的人们，他们也用爱回馈滋养他们的大山。他们用纪念与爱为这个地方取名“曰哈”（布朗语，意为小寨子），自称“本人”，意思是“本地守土之人”。是的，没有什么比守住自己脚下的这块土地重要而神圣。从“曰老”（保山坝子，意为大寨子）到“曰哈”，一次次丧失家园的布朗人懂得了坚守也懂得了珍惜，这是一次历史的放逐，被放逐的是布朗人的躯体，然而根植于布朗人灵魂深处的坚韧和善良却永远袒示给这块生生不息的大地。

从勐底坝一步步搬迁到枯柯河边的大山，这一路的迁徙带着屈辱和无奈，而大山依然属于当时的汉人管辖，布朗人称拥有土地的汉人为“山主”。土地从未真正属于过这些随时与泥土保持着亲密关系的“本人”。直到新中国成立，布朗人才有了自己真正的山地，阿公就是从“山主”手上接过土地的第一代埃乌（本人），那时，老叔刚刚降世，时隔恰好70年。

如今，老叔依然记得阿公告知他的，那一片山是汉人朱家的，哪一块田是汉人杨家的。还说起，在老家附近的崖子头上看到过，曾经的“山主”刻下的几个字：杨家水、朱家山。他们用这样明晰的标志来划分山地与水田的所属，带着不容置疑的占有和为此绝对的服从。一辈辈的布朗族便是在这样的租赁关系中，在自己深爱的土地上艰难求生的，带着沉甸甸的痛感。在搬迁新居时，“得埃乌”这三个字终于用碑刻的形式矗立在寨子中央，以宣告的方式成为了永久的地名。“本人的山”，这是祖辈们梦寐以求的夙愿，是布朗族朝思暮想的拥有，只有在今天，才能堂堂正正地告白于天下，那些结绳记事的过往终究随着一把火化为灰烬，本人

先祖的梦圆在这个崭新的寨子里，圆在这四通八达的水泥路上，圆在招展着蓬勃绿意的山间林地，圆在每一个后人的心中。

儿时，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情就是陪着父亲去给老叔打电话。那时交通不便，通讯落后，难得回老家一趟的父亲每每记挂家人，就得跑去商业局的三楼，穿过长长的走廊，走到尽头的会议室外那张办公桌边，摇动那台老旧的黑色电话机。摇了摇头转到摆榔乡，再转到大中村，老叔那时是大队干部，时常在村里驻扎。有时幸运老叔在，便有人去叫他，有时不在，只有说好时间，再打去。接的过程便是漫长的等待，而这时，父亲和我就安静地等着。他抱起我，走到会议室的窗口，指着东南方层层叠叠的青山说：你老叔他们就住在山的那边。看着被雾气锁住的山峦，让我觉得老家很遥远，遥远到不可轻易抵达。而实际上，那被深埋于大山叫做楂子树的老家，与县城真正的距离就30多公里而已。

最初回家的记忆似乎定格在小学时了，父亲带着我和阿姐，搭了一辆拉货的卡车，摇摇晃晃颠簸到姚关乡，公路便终结了，下车开始步行。父亲挑着扁担，一头是阿公阿奶爱吃的糖果、饵丝、面条，另一头是为他们新买的衣物，一些常用的药品。父亲用蛇皮口袋装满了沉沉的两袋，勾挂在扁担的两头，他在前面挑着，我和阿姐在后面边玩边跑。有时父亲累了，会找个阴凉的地方歇脚，顽皮的我会拿起扁担和阿姐拉拔河。有时父亲会采林里的野果给我们吃，我和阿姐会把野花插得满头都是，路边的草丛中不时有野鸡扑腾飞出，引来我们惊喜地大叫。回家的路虽艰辛却充满期待，因为在山的那端有老家亲人的期盼的目光，那目光似乎暗藏着神秘的力量，让人负累而不苦。记忆最深的一次回家是没有父亲的陪伴，那时的我已读高中，带着父亲给阿奶买的药和糕点，一个人踏上了回家的路，不巧半道忽然变天，下起大雨，水网一样密而紧实，牢牢罩住山峦。我跟着赶集的寨子人回家，他们负重而行，背着从集市上买回的生活用品，而我几乎空

身徒步，却被大雨困得迈不开脚，寨子人只好走走停停驻足等我，为了不让别人受累，也为了不让雨把药淋湿，我一只手护住包，一只手撑着伞，咬着牙跟上他们的步伐。不想在湿滑的坡地滚了一跤，摔得浑身泥水，脚踝破皮。接过他们为我砍的竹棍当拐杖，我才勉强支撑起自己颤抖的双腿，看着湿漉漉的背包，泪水和雨水交织着布满了我的脸颊。就这样跌跌撞撞，艰难地回到了家。当阿奶帮我擦伤口时，轻轻说了句：阿公，把我家骡子跌伤了。泪水再次忍不住滴落下来。时隔多年，那一幕清晰如昨。那一路，让我体验到了山里人们的不易，老家的亲人们便是在这样的山路上艰难求生的。那一路，让我更珍惜自己所拥有的生活，更珍惜老者的每一位亲人。

我刚参加工作那年，阿奶就过世了，阿公和阿奶故去后的老家，似乎丧失了某种特殊的魔力，让父亲不再魂牵梦绕。每年回老家的次数开始递减。而每次回去，都会发现这个小小的寨子在悄然改变，从当年的13户人家增加到现在的30多户，新的瓦房，水泥平顶在绿树间映现，过去的羊肠小路如今可通车辆，那些人背马驮的景象一去不返。我可以开着车陪父亲回去，停在阿公种的大青树下，几步路就到家。而如今，随着国家扶贫帮扶政策的实施，少小民族的生活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搬迁到“得埃乌”来的老乡们，开始与外界有了更多更频繁的交流。孩子们读书方便了，老人们就医无忧了，买卖有时在家门口便完成了，有的年轻人开了网店，做起了微商。

曾经阻隔在我和老家的山水，已被一条条明亮的道路连接，父亲和老叔随时在手机里拉家常，说年景，谈儿女之事，聊家乡的点滴变化。父亲对老叔说，我们都要保重身体，好日子要慢慢过，赶上好时代，我们是幸运呢。而这时，老叔常常说的一句话便是：是咯是咯，闭眼也值了。楂子树，那个名字上透着苦涩滋味的地域，那个曾经让祖辈们抛洒过血汗的家园，已改变了模样，它将被“得埃乌”这个带着归属感的名字所替代。

了，包谷收入几吨了，洋芋收入几千袋了。母亲悄悄透露，家里有可能当上万元户了。我看到这信，十分惊讶，天啊！万元户，这么个天文数字。因为那年月村里上千元的户数都是寥寥无几。随后我退伍回乡在县城找到了工作，回家和父母见面比在部队方便多了，常常回村看望父母。我看到家里确实发生了许多新变化，那间黑鸟鸟的茅草房换成了四五大间亮堂堂的大瓦房，母亲苍老宛若核桃皮的脸上绽放笑容说：“娃娃，妈妈没别的给你捎进城的，我这里烙几个洋芋粑粑给你带走。”

到上世纪90年代末，家乡突然说搞科学种植“脱毒洋芋”。父母跟我们说，种这洋芋祖辈辈几百年来从没有人说有毒，这上面的人简直就是神经病。母亲坦然地说：“只听说花有毒，药有毒，蛇有毒，怎么弄出个洋芋有毒。”我说这是科学实践出来的技术，尽管持有许多的怀疑态度，但是父母仍然听从我这个儿子的话。当年他们种植了“脱毒洋芋”5亩地，到洋芋开挖的时候，用秤一称，亩产从传统的七八百公斤猛涨到四千多公斤，增加了4倍还多。我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欣然走进村里，走进那片火红的红土地，看着父母收获“脱毒洋芋”的喜形于色，他们竟然在山间荡起的欢乐笑声里，扯开喉咙放飞出了清脆甜美的歌声：“洋芋哎，满地金黄，金黄黄耶，装满箩筐哎，那个喜洋洋耶，咱们日子旺旺旺哎……”

现如今，老家的洋芋在经历一场场“革命”后，显然不仅是当年充饥，“脱毒洋芋”这一新品种，走出了国门，销往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等国家。这是乡亲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呀！

味的洋芋就轮到父母头上吃了。哥哥把我和妹妹拉在一边悄悄地说，爹妈太苦了，他们也得有营养，不然身体拖垮了，我们全家人都得喝西北风去。母亲晓得后把我们拉进怀里，含着泪花说：“娃娃们，爹妈一辈子再苦再累都是为了你们，你们得好好成长，好好读书，将来走出这穷山沟。”看着母亲期待的目光，我们泪眼模糊地点头着。

到我读书时，洋芋仍然是我住校读书交伙食换饭票的唯一希望。可心地善良的母亲为不让我在学

校里被人看不起，能交上和别人一样的米面，在厚着脸皮跟亲戚朋友借的同时，常常是整夜地打

草鞋，或找空上山采摘野菜，到赶

乡街子的时候背上大箩的草鞋和山

茅野菜到集市上去卖。到晚上

回来的时候，我看

着母亲像战场上获

胜的大将军，脸笑得一朵花似

的，把口袋里的硬币掏出来，在

油灯下轻声地数着：壹分、贰分、

伍分……看着母亲在街上从来舍

不得吃一碗米线和一碗凉粉，或

买一块新布给自己缝一件新衣，

父亲心疼地说：“你不要太吝惜了，一碗米线钱都不想花。”母亲

姐夫

赵建平

姐夫出事的时候，我刚办好住院手续。走进病房还不到十分钟，富源教书的侄女打来电话，说姐夫在昆明，冠心病发作，意外去世。

噩耗传来，那一分钟，内心又紧又疼。

几年来，舅舅病故，母亲离世，最小的姐姐，也因恶疾而离开我们。悲伤的阴影还没散去，姐夫的生死离别，又让我陷入巨大的悲痛。

谁能想到姐夫，竟然走得如此匆匆。一直以来，他的身体非常地好。就在去世的前一天，姐姐说，他还在工地忙碌。

生命的故事，向前延续，却又不知终于何时。就像姐夫，来与去，即如赶赴一场前世今生的约定。赶赴的速度，总超乎我们的想象，也超乎我们的预料。

姐夫走了。文字里，我实在不愿意写到“死亡”这个词。生命的无常，既让人大观，也让人狭促。

十年之前，侄女大学毕业，分到富源。

数年之前，侄儿在云师大参加工作。

而最小的侄女，还正在昆明读着大学。

三个孩子，在姐夫和姐姐的抚养下，终成器皿。其间艰辛，也只有姐姐姐夫知道。为孩子读书，他们经常赶着骡子，去贵州土城驮日常杂货，回来在乡街上摆地摊，赚取孩子的读书费用。那钱，一分一厘挣得不容易，姐夫说是脚底板赚来的血汗钱。

去土城的山路弯弯曲曲。姐夫上学的路，同样是弯弯曲曲。姐姐和姐夫卖完货又去驮，驮又来卖。那些驮来的米花、炒面或作物种子，赚不了多少钱，但姐夫说凑毛赶趁。时间久了，这分分厘厘攒下来的钱，用处被姐姐和姐夫发挥到了极致，三个孩子先后被送入初中、高中，最后全送入大学。

我的姐姐没有进过学堂，算账的事，只能依靠姐夫。姐夫识文断字，坐在姐姐旁边。姐夫管，姐夫管算账收钱。再后来，开支越来越大，姐夫的地摊生意，支撑不了全家人的生活。姐夫就想外出打工。他不放心姐，就手把手教姐姐识字算账。现在，姐姐能识别电话号码，能清算简单的钱财账务，这应该是姐夫的功劳。他既是姐姐的好丈夫，也是姐姐的好老师。

姐夫的原生家庭，历经几次组合。身为长子的他，自然成为家中的顶梁柱，吃了很多的苦。有一年，他们家的房子被山洪冲走，不得不选址造房，从开挖屋基到推土平场，从木材准备到采土制坯，从夯土为墙到锅碗瓢盆置办，无一不经过姐夫操劳。因为盖房子需要篮子撮箕，姐夫就砍来竹子学着编织。房子盖好，他也学会了手艺。人家说一开门手艺活一家人，可姐夫的篾匠活，既养不了家也糊不了口。有人请他编织背篓竹篮，他学不会拒绝，就连工钱都不收，姐夫说收钱就没了感情。有人说姐夫憨，有人说姐夫傻。在我看，姐夫却是不憨不傻。因为这些，姐夫结下的人缘，在村里，是最好的一个。

我家劳力少，家里需要种地，大多靠姐夫。农忙时节，姐夫忙上忙下，忙里忙外。等我周末回去，农活已被姐姐和姐夫忙完。家里要翻盖猪圈，父亲把料子拉来，姐夫把石料沙子背回家，转身又请人帮着把猪圈盖好。父母不能劳动的时候，家里的部分土地，就交给了姐夫。有姐夫在家，我们少操了很多的心。

父亲是急性子人，对农活，从来不马虎，稍不满意，就会说姐夫几句。姐夫一边听，一边做，从来没有听说过半句怨言。知道姐夫去世的消息，我在医院里打电话给他，我们家的顶梁柱倒了，接到电话的父亲说。

听到这句话，我的心一颤。原来，在父亲的心里，他早已把姐夫当作亲生的儿子。“顶梁柱”这个词，从父亲的嘴里说出，终让我读懂姐夫在父亲心里的位置。

姐夫不太多，喜欢抽自家种的老旱烟。几十年的烟龄，一说话，满嘴黄芽就露出来。他也喜欢喝酒，一喝酒，话就多，虽是慢慢悠悠，声音却比平时高。姐夫实诚，有些倔，他们刚结婚的那几年，姐夫想去学开拖拉机运输。这是一件大事，姐姐和父母有些担心，可姐夫一再坚持。等学会了拖拉机，他又托人从信用社贷了款，自己东挪西借也拼凑了一部分。把拖拉机买回来，姐夫高兴坏了，跟姐夫说，这拖拉机买得值。在我们村，姐夫是第一个开拖拉机跑运输的人。他能吃苦，又愿意吃苦，一年多的时间，就还清了债务。几年后，跑运输的人多，挣不了钱，姐夫卖了拖拉机，干脆跟着别人，就跑到外面打工。

姐夫没有技术，打工单凭一身力气，当然挣不到钱。可开支却天天

要，常常是算着有，吃着无。有时辛苦一年到头，最后还拿不着工钱。空着两只手出门，却也空着两只手回来。姐安慰姐夫，说就在家找活计做，也能照应家里。那个时候，正是他们家经济最困难的时期，三个孩子都需要钱。姐夫没有办法，便到了附近的煤厂上班。挖煤炭是苦差事，亲戚朋友不待见，还冒着极大的风险。但工资高，发放又及时，这对姐夫来说，无疑是极大的诱惑。

姐夫采煤的地方，离家不远不近，有好几公里的路程。姐姐身体不好，家里犁耙地背粪铲点种收割，大多要等姐夫下班回来后才能做。姐夫原来喝酒，姐姐会埋怨，说饮酒伤身。可从姐夫去煤厂上班后，姐姐就再没埋怨过。每次去看他们，我劝姐夫少喝酒，姐夫却侧过头，说就让他喝点吧，全家人都靠他，喝酒解乏。五六十岁的人，还要挖煤炭扶娃娃读书，全村哪个像你姐夫？

姐这样说，姐夫看着姐，笑着。而我，听着姐的话，心里却是滋味。

姐说的对，在我们老家，真没有哪一个像姐夫，拼命挣拼命苦。一个月能苦多少呢？满满打满算，姐夫说，上足班，加上五十元的满勤奖，有三四千。三四年，勉强可以应付三个孩子的费用。姐夫实在不敢闲下来。

姐夫先是在附近的煤厂上班，后来又跑去贵州，同样是当下井工人。一次矿难之后，姐夫就不再回去，再穷，说什么也不能当下井工人。

姐夫被吓着了。

别人靠手艺吃饭，姐夫靠力气养家。附近的煤厂，也出现过几桩事故，可姐夫运气好，每次都平安无事。这让姐夫高兴，说老天爷在保佑他。近两年，他的负担减轻了许多。但姐夫说什么也要坚持去挖煤炭，他说等最小的侄女大学毕业，到时他想怎么闲就怎么闲，高兴去哪里就去哪里。说这话的时候，我想，是不是姐夫到那个时候，酒也高兴喝多少就喝多少呢。如果那样，我就陪着他，让他好好喝，直到喝出酒味，也喝出意思来。

我每次回老家去，有人说他们家的三个孩子争气，不枉姐姐的难，也不枉姐夫的苦，他们说姐姐姐夫苦得值。我不知道这个值，对姐夫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说值得，仅指姐姐和姐夫，靠摆地摊和挖煤炭，培养出一个大学教师和两个中学教师，这真的值得，有多少人能做到呢？可这值得的背后，却掩藏了他们无数的辛酸和痛楚。

我的父母是典型的农民，他们的思想里，却拥有很多农民所没有的对文化的敬畏。父母身上这种宝贵的品质，深刻影响到了姐姐和姐夫。别人庸庸碌碌，他们勤勤恳恳。别人安于现状，他们在憧憬未来。别人对孩子任性放纵，他们对孩子严格要求。因为这样，姐姐和姐夫，倾其一生，让三个孩子受到了很多农村孩子没有受到的良好的文化教育。姐姐和姐夫，说不出高深的道理，书难人要学，人穷志要立，这是姐夫常跟子女说的话。他们一辈子用自己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坚毅，和甘于清贫的精神，给予孩子最好的培育。

挖煤炭抚养孩子读书的人，在农村，不止姐夫一个。可像姐夫那样，从宣威挖到富源，从云南挖到贵州，一挖就二三十年，在我们老家，却是绝对没有。他是我们村挖煤时间最长，挖煤年龄最大的下井工人。

我与姐夫素来亲近。前几年，母亲还在世，曾希望和姐姐姐夫一起居住，陪陪父母。可姐夫怕别人说三道四，最终没有来。看到村里家家忙着盖房子，姐夫心里也想新建房屋，条件不允许。盖房子的梦，姐姐和姐夫做了多少年，最后，却一直没有实现。

人生总在摇摆中度过。

一直认为，生命的旅途，向着生，也向着死。我的摇摆的姐夫，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以善良和悲悯去经营他的梦想。而生命最极致的颜色，竟然是与他结下不解之缘的漆黑、墨黑和暗黑。

最近一次与姐夫相见，是姐夫在宣威住院的时候。我去看他，姐夫的头上缠满了绷带。当时不知何以如此，后来才知道，姐夫下班回来，遭到别人的暗算。伤害者非别人，而是姐夫最小的同母异父的弟弟，姐夫从医院出来的时候，身体已是大不如从前，他再也无法继续他挖煤炭苦钱抚养儿女读书的事情。他和姐姐一道，辗转曲靖昆明，找一些轻巧的活计。手足薄凉，对于姐夫来说，还有什么比骨肉相残更让他绝望呢。

事隔数月，姐夫离世，六十岁，刚好一个甲子。

姐